

· 鲁迅研究 ·

鲁迅的当代意义与超越性价值 ——在“30后”与“70后”鲁迅研究者对话会上的讲话

钱理群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要]鲁迅是一位具有原创性、民族精神文化源泉性的作家思想家,整个民族遇到问题,可以到他的文学与思想的内部去不断吸取资源。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历史研究,而必须面对当下现实。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存在,他毕生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的改造,鲁迅研究不断有新发现不断深化的关键,在于研究者不断找到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的问题,在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的同时,更应该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社会制度、所有发展模式、所有文明,都发生了危机,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创造。只有在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考的意义。中国要走出自己的发展道路,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现当代中国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鲁迅的思想是创造这样理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鲁迅的意义,普遍认为是拔得太高,实则认识远远不够。

[关键词]鲁迅;鲁迅研究;时代问题

[中图分类号]I206.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3842(2016)03-0015-07

28年前我第一本鲁迅研究著作《心灵的探寻》前面有两句题词,第一句:“向青年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完成。我应该自动隐去。但仍寄希望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将在中国当代的青年中产生。”很多人看了感到惊奇,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还专门找我谈话:“你怎么刚出山就要隐去?这是什么意思?”其实这是说出了我给自己的定位:我从一开始就深受鲁迅“历史中间物”思想的影响,认定自己在鲁迅研究中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任务就是既当句号:继承前辈;又当引号:为年轻人开路。自身局限性太大,不会有有多大创造,向青年讲出了自己的鲁迅观,包括曾经有过的失误,就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自动隐去。总结我的鲁迅研究,如果有点贡献,就是向青年讲鲁迅;有点影响,也是激发了部分青少年阅读、研究鲁迅的热情和兴趣。

我本以为在八十年代讲完了我的鲁迅观,就可以退下来,做我更适合、更想做的事。没有想到,九十年代以来,一直有一股否定鲁迅的思潮,而且越演越烈,这样,我就退不下来了,只能坚守在讲台上,继续讲鲁迅,而且越讲越起劲:从大学、研究生院讲到中学、工厂、社会;同时针对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继续研究鲁迅,即作鲁迅的当代阐释。这样,就赖着不走了,一赖就是28年。现在,总算退下来了,我对自己的鲁迅研究成果评价也不高,顶多有一点个人的特点,但缺少原创性,在很多方面都与鲁迅有些“隔”,没有真正地进入鲁迅世界,更不用说始终没有跳出鲁迅,在更高、更广、更深的视野下,评价和研究鲁迅了。我自知自己的研究是很容易被后来者超越的。

再回到28年前的现场。我当时说“鲁迅真正的知音必定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具体所指,就是八十年代的大学生。以后,我又寄希望于“70后、80后”,大概就是在座的诸位。我曾有过一个演讲,提出“沉潜十年”的要求,就是要像鲁迅在沉默十年时期那样,沉到古代,潜入民间,沉潜到历史的最深处,时代的最深处,社会的最深处,生命的最深处。我向“70后、80后”(或许还有“60

[作者简介]钱理群,著名学者,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后”)提出这样的要求,是出于我自己这样的“30后”和在我之后的“40后、50后”的不满。

我自己这一代,最大的问题是成长于建国后“与传统断裂,和世界隔绝”的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下,因此,除个别人,大多数对中国古代与世界(西方与东方)都是隔膜的,这样的知识结构与相应的精神境界的根本问题,就造成了我前面说的和鲁迅的根本隔膜。“40后”与“50后”当时还比较年轻,无论在西学还是在中学上都及时地补了课,回应了改革开放新时代提出的问题,因此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也看好他们而全力予以支持。但很快就发现了他们的问题:一是他们对西学和中国传统的知识既是补课得来,因此除个别杰出者外,总体来说都显得半生不熟。更重要的是,他们成长于“文革”的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下,在具有较丰富的人生体验的同时,精神气质上也接受了“文革”的消极影响,有的人(当然不是全体)在掌握了学术权力以后,就显露出一种霸气,甚至流氓气。

正是基于这样的失望,就把目光转向“60后、70后、80后”,期待基本成长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年轻一代,经过十年的沉潜,在知识结构与精神素质上有一个根本的改变。现在十年已经过去,诸位终于以生力军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你们的知识结构、视野、眼光,都逐渐赶上、甚至超越了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前代人,这是我感到欣慰的。但同时,我又确实有许多担忧。这主要是由你们的生存环境影响下的生存状态的诸多问题引发的诸多困惑。

我曾经谈到,我们这一代,人生的前半部都比较曲折,但在八十年代进入学术圈以后,则比较幸运,不仅我们的老师,整个学术界和社会,都为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使我们得以心无旁骛地全身心地投入学术之中,因而使自己的才能都得到较好的发挥。至于前面说到的问题,是先天不足导致,是一种历史的局限。相比之下,今天要坚守学术就困难得多了。

前不久,《书城》发表了一篇我给你们的同代人、华东师大历史系的唐小兵写的书序。他的书里谈到当代大学青年教师的生存状况,我比较同意他的分析。即,有四种不同的选择。一部分人主动投靠权力来获得自己所渴望的名与利,我这些年一直批评的“高智商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指的就是这批人。不过,我对他们也有理解的同情:他们大都有一定的学术实力,也雄心勃勃想干番大事,但却处在前面提到的学院学术霸权的压抑之下,他们想出头,就只能投靠政治权力。因此最初都有些忐忑不安,但一旦尝到甜头,就乐此不疲,理直气壮地当奴才了。第二种人是大多数,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仍然坚守自己的学术,坚守学院知识分子的底线,但又尽可能远离现实,不和权力发生冲突,在现行学术、教育体制下小心翼翼地寻求发展空间,有时还必须作出种种妥协,这是一种十分艰难的维持,我是充分理解的。第三种人既不愿意与权力合作,也不愿意离开体制,就自觉边缘化,什么项目都不报,职称给不给也无所谓,用别的方法求生,表面看活得也还可以,但精神上的压抑、苦闷是掩盖不了的,当然也更让人同情。第四种人,面对压抑与诱惑,坚持学术而不忘家国情怀,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坚持精神、理想的追求,作韧性的反抗。这样的人很少也很孤独。我对这样的坚守者是心怀敬意并倾力支持的。但又深知这样的鲁迅式的“反抗绝望”是要付出巨大代价的,因此也不敢向大多数人推荐。我对自己的学生和熟悉的年轻朋友的要求是,不要越过“底线”。最近学生聚会时,我有两句话,也不妨送给在座的各位。第一句:凭兴趣做学问,凭良知教书做事做人。第二句:可以做奴隶,但不要做奴才。大家不难体会我提出这样的要求的无奈与沉重。

我这样说,也是以鲁迅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分析与把握作为依据的。鲁迅说,中国的历史是“一乱一治”的循环:“治”就是“做稳了奴隶”,“乱”就是“想做奴隶而不得”。鲁迅是在1925年所写的《灯下漫笔》里作出这样的判断的,他在文章结尾处,发出了这样的召唤:“创造这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

这些年大多数国民、知识分子,或许也包括我们自己,尽管对现状有诸多不满,但实际上是安于、甚至是努力适应、顺应于现状的,因为大家都求稳怕乱,害怕现状打破,“想做奴隶而不得”。我正是根据这样的现实的生存状态,而提出“即使不得不做奴隶,也不要做奴才”的。这也是来自鲁迅的思想,鲁迅是把“奴隶”与“奴才”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分的。鲁迅常说,当奴隶不要紧,挣扎失败

了还是奴隶也不要紧,最可怕的是做奴隶还要从中寻出美来,加以美化,奴隶就变成奴才,成了帮闲、帮忙和帮凶了。可以说,奴隶是一种体制造成的客观地位、处境;但这里仍然有一个主观选择的问题:是安于做奴隶,还是不断挣扎、抵制、反抗,即使失败也心存不服不满而保持心灵的相对独立;如果更进一步从中寻出美来,主动选择作奴才从中获利,那就是出卖灵魂,失去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了。这样一个主观选择问题,在当下中国社会“如何活法”的问题,对我们这些鲁迅的研究者,或许是具有根本性的:很难想象,一个安于做奴隶的人,一个千方百计想挤进奴才队伍的人,能够进入鲁迅世界,在鲁迅研究上作出真正的成绩。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对象——鲁迅就对我们的人生选择,个人精神品德节操提出了很高的、另一个意义上、也是基本的要求。要真正提高鲁迅研究水平,关键还是研究鲁迅的人的基本素养、素质的提高。我对自己这一代,以及以下几代人的不满,也正是出于对中国知识分子整体性的知识与精神状态的担忧——这就是在今天这个“30后和70后的对话”中我最想说的话。

下面,再就鲁迅研究,谈四点看法。

首先,我还是想讲鲁迅研究的意义。和学界与社会上普遍认为对鲁迅的意义拔得太高相反,我始终觉得我们的认识远远不够,对于鲁迅的意义还有更深入讨论的必要。这也是我在各个场合反复谈到的我对鲁迅的意义的一个基本看法和判断。

鲁迅是一位中国具有原创性、民族精神文化源泉性的作家、思想家。对于现代中国,他的文学与思想是具有原创性的;对于整个中国民族文化,他的文学、思想又具有源泉性,整个民族遇到问题,可以到他的文学与思想的内部去不断吸取资源。这样的原创性、源泉性的作家、思想家,每个国家、民族是不多的,比如说英国有莎士比亚,俄国有托尔斯泰,印度有泰戈尔,德国有歌德等等。鲁迅对中国的意义,就相当于莎士比亚之于英国,托尔斯泰之于俄国,歌德之于德国,泰戈尔之于印度。他们的作品是国民基础教育、培育民族精神的基本教材,是每一个有教养的英国人、俄国人、德国人、印度人必读的,而且是要读一辈子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对鲁迅的认识就远远不够。

这些年,不管别人怎么说,我一直坚持,中国教育必须讲鲁迅,教鲁迅,成为中小学教育的基本教材,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上的高度自觉。我曾经和很多文学史专家、教育专家讨论,在中国,有哪些原创性、源泉性的作家作品,应成为中学必修课和选修课的基本教材。比较一致的意见,是五大课程:一是《论语》,二是《庄子》,这是中国文化的起源;三是唐诗,这是中国文化的高峰、高潮;四是《红楼梦》,这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五是鲁迅,这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新开拓。学了这五大课程,每个学生不管他将来从事什么职业,就都有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底蕴,为人做事的精神底气。这是一个民族精神建设的基本工程。

这些年许多人都在强调,要走出中国自己的发展道路,必须特别注意从中国传统文化里吸取资源。这本身并不错。但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却十分狭窄,局限于中国古代文化,古代文化里又局限于儒家文化,恰恰忽略了,已经有百年历史的中国现代文化也是一种传统,鲁迅的思想与文学被冠以“反传统”的罪名更受到普遍的排斥。这叫“抱着金娃娃讨饭吃”。其实鲁迅所面对的问题,是最接近今天的,在文化上说,在诸如如何对待西方文化和中国古代文化这些基本问题上,鲁迅都有非常独到的见解。我曾经提出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经验(其中也包括文学经验)”的概念,鲁迅的文学与思想无疑是其中重要部分,当我们面对现实的中国问题时,鲁迅的经验(文学经验)就具有直接的启示作用。我还说过,当代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历史责任,是要创造出对现当代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具有解释力与批判力的理论,这样的创造,需要理论资源,而鲁迅的思想应该是最重要的资源之一。这个问题,我们在下面还会有进一步的讨论。

第二,《心灵的探寻》还有另一个题词:本书“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这背后其实是有一个鲁迅观的,即把鲁迅看作是“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思想

家和文学家,并实际从事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实践者有着紧密的精神联系。这并非我的原创,记得王得后先生就说过类似的话,它是代表我们这一代人的对鲁迅及“鲁迅与我们”关系的一个基本看法的。这也包含了我们对鲁迅研究的一个基本看法,把“鲁学”看作是“人学”,即中国人的改造之学,是“社会学”,即中国社会的改造之学。

这里,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鲁迅研究跟其他现代作家研究有什么区别?在我看来,主要有二。其一,作为“人学”,鲁迅文学的最大特点与魅力就在对人的灵魂开掘之深。这就决定了鲁迅文学不仅要搅动读者的灵魂,首先要搅动研究者的灵魂。至少在我的经验里,面对鲁迅,是无法“隔岸观火”,而必要将自己“烧进去”的。鲁迅对于我,不仅是研究对象,更是精神对话的对象。在我遇到现实生活和人生道路的困惑时,就习惯性地打开鲁迅著作,从他那里吸取精神资源与力量。这样,鲁迅就自然融入了我的生命之中,用现在的说法,我和我的研究对象构成了“命运共同体”。在我研究其他现代作家时,就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可以有共鸣,却难有生命的融合;可以得到启示,却很难影响生命的成长。

其二,作为“改造中国社会之学”,鲁迅文学的另一个巨大魅力,就是他对中国社会问题开掘之深。鲁迅文学,特别是他的杂文,面对的都是现实生活里的具体的人和事,但他总要开掘到历史的最深处;中国文化的最深处;人性、国民性的最深处。因此他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思考,就不仅具有现实性,更具有超越性。他的思想文学不仅面对他的时代,更伸向未来。于是就有了“活在当下的鲁迅”的说法。我常说,鲁迅对于中国,是一个“现在进行时”的存在。有人曾把鲁迅揭露三十年代中国文学界的种种怪事的杂文,改一个题目叫“鲁迅论当代中国文坛”重新发表,大家都觉得好像鲁迅就在对现实发言。这也就使得我们的鲁迅研究很难作纯粹的历史研究,而必须面对当下中国的现实,这就给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当代阐释,留下了很大的空间。

以上两大特点,也决定了读者对鲁迅的阅读与接受。记得我在80年代讲鲁迅,不仅自己极其投入,学生也极其投入,那样的“生命共同燃烧”的鲁迅接受场,大概永远不会再有。从90年代开始,学生听我的课,就分为两派。尽管可能是受我讲课的影响,大家都尊敬鲁迅,但在鲁迅与自己的关系上就发生了分歧。一派学生认为,鲁迅应该进入博物馆,我们尊敬他,但不愿意让他来影响自己的生活:鲁迅太重,我想活得轻一点。而另一些学生则说,我就是不满意于自己活得太轻,太混沌,我渴望像鲁迅那样思考沉重的问题,活得更清醒,更认真,更有意义,就希望鲁迅进入自己的生命。从90年代到现在,青年对于鲁迅的态度大概就是这两大派。有意思的是,无论是拒绝,还是接受,都与各人自己的生命选择有关。这恰恰反映了鲁迅文学是真正的生命之学;每个人有权选择自己的生命存在方式,也就有权接受或拒绝鲁迅。而且青年多变,今天拒绝鲁迅,明天自己有了新的阅历,面对新的问题与选择,又反过来走近鲁迅,这是鲁迅接受史上经常发生的事。而且即使终身拒绝、远离鲁迅,也是正常的:为所有的人都接受的鲁迅反而不是不真实的。接受鲁迅,特别是生命投入式的接受,永远是少数人。

这样的接受者就不会局限在学院里。我曾经说过,鲁迅的真正知音在民间,那些关心、思考、参与中国人和中国社会改造的民间思想者与实践者,在一定意义上,是比学院里的知识分子更接近鲁迅的。这就涉及到今天谈到的话题:有没有民间鲁迅与学院鲁迅的区分,以及两者的关系问题。

我觉得民间鲁迅还是有的,我自己就是从民间鲁迅研究者走向学院派鲁迅研究的。我最近刚给一位打工者写的《我们还需要鲁迅吗》一书写了篇序言。作者从1990年来北京,在北大附近的中关村漂泊了二十多年。在为生计奔波的同时,又为精神的苦闷不能自拔。就在这种情况下,遇到了鲁迅。他一遍又一遍地读鲁迅原著,又读我和其他鲁迅研究者的著作。他对鲁迅的熟悉,让我大吃一惊,引述鲁迅著作几乎随手拈来;他对我的研究著作阅读的认真,更让我感动。从他写的大量读书笔记看,他是真正读进去了。他是带着自己的问题读鲁迅、研究鲁迅的:他说自己要“以小民之心,从小民的视角,看一看,想一想,鲁迅这位医生,对于我们这个民族的肌体及精神的诊断准确

否？我们身上那艳若桃花的红肿还在否？倘若按他开出的药方去治疗，能痊愈否？”最后他就对也是这个时代提出的“我们还需要鲁迅吗？”的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回答，写成了这本书。我拿着这本沉甸甸的民间鲁迅研究著作，立刻想到40多年前，我也写过一本《向鲁迅学习》的书。这是我在“文革”期间给“民间思想村落”的青年朋友讲鲁迅的讲稿，以及我自己写的读书笔记汇集而成，当时还没有条件打印成册，是一个手抄本。写完了想寄给大学的老师和研究专家看，却顾虑重重，不敢寄出，又不可能发表，就只好送给老伴，算是一段生命历程的纪念。但也就奠定了我的“生命投入式”的鲁迅研究的基础。或许正因为有了这一段生命历程，我对民间鲁迅研究有深切的感受与理解，始终认为学院鲁迅研究与民间鲁迅研究是息息相通的，应该相互支持与吸取。

其实，这样的对鲁迅的民间接受与阐释，是随时发生的。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初，有两件事是可以进入鲁迅接受史的。一个是“赵家人”突然成了网络上的热词，这一说就源于鲁迅的《阿Q正传》：赵太爷对阿Q说：“你配姓赵？”这样的等级分明，连姓氏都要垄断的权势者，是很容易让人想起当下中国社会的权贵资本阶层的；可以说，鲁迅的“赵家人”一语道破了人们早已不满而又说不清楚的两极分化与对立的中国的现实本质，是极具解释力与批判力的。其实，鲁迅在《狂人日记》里，还有一句：“那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我怕得有理”。对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的某些现象也很有解释力与批判力。这是很能显示鲁迅文学与思想的生命力的：鲁迅的思想与语言，在网上的传播还会继续下去，人们将不断从鲁迅著作中开掘新的批判性资源，鲁迅也将在网络时代更深入地走向中国的民间社会：这是可以期待的。

再就是李静编剧的，由“80后”一代人执导和演出的话剧《大先生》。我看了以后，曾评论说，这是一部思想者的剧作，在这个文学创作与戏剧舞台思想普遍贫乏的当下中国，是十分难得的，而它的思想资源与灵感正是来自鲁迅。这部剧作构思最巧妙的地方在于选择了鲁迅逝世前的瞬间。这正是历史的一个交接点：剧作前半部，鲁迅与许广平、朱安、母亲，以及与周作人、胡适的对话和思想、情感纠葛，结束了“前历史”；然后就往后走，一直走向当代。全剧的中心，实际上是在回答一个人们经常提出的问题：鲁迅如果活在当代，会怎么样？也可以说，作者是在“接着鲁迅往下讲”。在熟读鲁迅，又有了自己的感悟以后，一方面，试图以鲁迅的思想与眼光、方法来看现实中国社会；然后又用当代人的思想、观念、情感来看鲁迅。正是这样强烈的当代感震撼了观众。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也是构成了戏剧后半部核心的，一个是那把椅子，要表达的是鲁迅对中国革命的思考；另一个是对革命成功以后的被称为“天堂”的中国社会的观察与表现，表达的是鲁迅对“黄金世界到来以后”的思考与隐忧。这两个方面，都抓住了鲁迅思想，特别《野草》时期与鲁迅生命最后十年的思考的要害；这也是当代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的两个最尖锐也最有争议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作者是抓住了鲁迅思想的核心来面对中国当代问题的核心。这本身就显示了作者非凡的眼光与胆识。这是《大先生》一剧的主要价值与成功之处。至于作者对鲁迅这两方面的思想的理解和表现，是否有些简单化，用戏剧的方式来表现如此重大的时代主题，有没有问题，这都是可以讨论的，反而不那么重要了。而在这两个关键问题上鲁迅的观点，以及作者的理解、阐释与表现，会引发各种争议，更是正常的，甚至是我们所期待的。这2016年以戏剧形式出现的民间鲁迅研究、阐释，对我们学院里的研究，是一个启示，更是挑战：鲁迅研究在注意其思想与文学的丰富性与复杂性，不断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的同时，也要抓住鲁迅思想与文学中的重大课题，面对现实中的重大问题，不断开掘与发扬鲁迅的思想锋芒与怀疑、批判精神。我们的研究应该追求精细与大气的结合。

第三，在《心灵的探寻》里这样谈我对鲁迅和对鲁迅研究的理解：“鲁迅（鲁迅其人，他的作品）本身即是一个充满着深刻矛盾的、多层次、多侧面的有机体。不同时代，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工作者都按各自所处的时代与个人的历史背景、哲学、思想情感、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角度、侧面去接近鲁迅本体，有着他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由此而构成一个不断接近鲁迅本体的，没有终结的运动过程。也正是在各代人广泛参与的过程中，鲁迅逐渐成为民族共同的精神

财富”。这里讨论的是鲁迅研究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一方面强调了鲁迅本体的客观存在,同时强调研究者主体对研究对象的客体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同时这样的再创造又要受到客体的制约,阐释、再创造的科学性,是以是否接近研究对象的本体为标准的。这里讲的“发挥、再创造”其实就是前面谈到的“接着鲁迅往下讲”。也就是说,研究者的研究,对研究对象是增添了新的时代内容的。这样的鲁迅研究者跟鲁迅的关系,和儒学研究者跟孔夫子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在《论语》成为经典以后,历代儒学研究者的读经、讲经,都是有发挥、创造的,以致形成了朱熹的儒学,王阳明的儒学,等等。因此我们今天讲“儒学”,就不只是孔丘一个人的创造,还包括了已经被称作“朱子学”“阳明学”的这些阐释者的再创造。

鲁迅研究最终也要发展为“鲁学”,每个研究者都应该为这样的“鲁学”作出自己的添加、贡献。每个人从事鲁迅研究的最高追求,应该是创造出一个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这当然是一个高水平,高要求。我们应该以此作为自己努力的目标。我在前面谈到我对自己的鲁迅研究不满意,就是因为我并没有创造出属于自己的鲁迅阐释体系,这是我的一个大遗憾。自己受先天不足的限制,就把希望寄托在后来者。期待青年鲁迅研究者,以此为努力目标,即使做不到,也要心向往之。

第四,怎样才能有独立的新阐释,新创造?关键是要有自己的问题意识。我曾经跟我的学生说过,我的鲁迅研究有前期、后期,面对的是两个不同的当代问题。

《心灵的探寻》面对的是“文革”极左思潮造成的思想、文化的混乱,以及自己精神的困惑,目的是要走出“文革”,找到在长期奴化教育下失去了的自我。当时的问题意识有二,一是历史的追问:自我独立性是怎么丧失的?一是自我的审问:知识分子在专制体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因此《心灵的探寻》强调的是“个体的鲁迅”和“人类的鲁迅”,特别突出“作为独立知识分子的鲁迅”,以及他对“帮闲、帮忙、帮凶的知识分子”的批判。这也是与八十年代个性解放和“走向世界”的时代思潮相呼应的。我并没有因此完全否认“民族的鲁迅”和“社会的鲁迅”,但却将它搁置起来,这就是前文涉及的带着所处时代的问题去阅读与研究鲁迅,在必有所发现的同时,也必有所遮蔽。

到2001年写《与鲁迅相遇》时,就面对完全不同的时代问题:中国发生的由社会贫富不均和社会发展不平衡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以及知识分子的分化。由此提出了“知识分子(首先是自我)的历史选择”的问题。在这样的问题意识下,“民族的,社会的,阶级的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鲁迅”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鲁迅与自由主义的论战,鲁迅提出的“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鲁迅与左联的关系……都成为《与鲁迅相遇》一书的主要论述内容。退休之后,面对我所说的权力与市场结合的现实,我又明确提出了“左翼鲁迅”的概念,继续强调鲁迅的左翼立场:他的社会平等的理想,站在平民这一边的选择,永远不满足现状的怀疑、批判精神。同时将鲁迅的左翼与党的左翼的盲从性区别开来,突出他的独立性、他对“革命工头”“奴隶总管”的警惕,特别是他对“革命胜利以后”的中国的隐忧。这都反映了随着对中国现实问题认识的深化,对鲁迅认识的深化。当然,这都是我自己的研究历程,具有很大的个人性。今天讲这些,只是为了说明,不断找到属于时代,又属于自己的问题意识,这是鲁迅研究得以不断有新发现,不断深化的关键。这背后又是一个如何正确地把握时代与自己的问题。

这正是我最想和青年鲁迅研究者讨论的问题:你们面对的是时代的什么问题?人们最容易想到的是现实中国的诸多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问题。但这不是我最想讨论的问题,我更想说的,是更具有超越性的问题。这也是有针对性的:我始终觉得,我们的研究,包括鲁迅研究,一直存在两个问题。要么脱离现实,要么和现实贴得太近,缺乏距离感。脱离现实的问题,经常有人讲;而缺少大视野,超越性眼光的问题,却少有提及。在我看来,这或许是更带根本性的。这也涉及对鲁迅的看法,我们都比较注意鲁迅对现实的关怀和介入,却很少注意鲁迅的超越性思考。

我在和年轻人的多次谈话里,都提出一个问题,也不妨和在座的诸位谈谈。我今年76岁,在座的跟我年龄差别可能30岁、40岁、50岁。我想问的问题是,从你们现在到我这个年龄,这一段时间

内中国和世界将面临什么问题,你自己将面对什么问题?我觉得要思考这个问题。别的研究者可以回避,但鲁迅研究者必须面对。在我看来,只有有一个“未来三、四、五十年的中国和世界”的大视野,在鲁迅研究上才可能有一个大境界,更深刻地把握鲁迅的意义。我自己思考这一大问题,是从2008年汶川地震引发的,我敏感到,“中国,以至世界,将进入一个自然灾害不断、骚乱不断、冲突不断、突发事件不断的多灾多难的时代”。到2011年发生的许多事情,更使我得出了一个“全世界都病了”的概念:中国病了,美国病了,日本病了,北欧也病了。这就意味着,现在世界上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无论是资本主义制度还是社会主义制度,所有的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北欧模式,还是中国模式,所有的文明,无论是印度文明、中国文明、美国文明、伊斯兰文明,都发生了危机。过去面临局部性危机时,解决问题的方法很简单:中国有病,就学美国资本主义,这是右派的观点;学北欧民主社会主义,这是左派的观点。现在美国、北欧自己都有了病,再学习它就需要考虑,至少不能简单搬用了。现在看得越来越清楚,我们原有的知识,原有的理念,都解释不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问题。用原教旨的自由主义的观点,或左派的观点,分析当下发生的许多事情,无论是阿拉伯颜色革命,还是华尔街占领运动,都会作出错误的判断。颜色革命并没有像自由主义者期待的那样,成为“第三次民主浪潮”,华尔街占领运动也没有像左派预言的那样,“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现在中国知识分子的问题,恰恰就是固守自己原来的立场和观念,把现实发生的一切,都硬套到自己的理论体系里来加以解释,结果是相形见绌,漏洞百出。现在正是一个“理论是灰色的,生活是长青的”时代。现实生活在急剧变化,亟需新的理论创造。

现在正需要对既有、既定的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检讨和反省,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创造。这也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我不赞成文明崩溃论,也不赞成文明崛起论。也就是说,我们既要正视文明危机,但也不要因此而走向“文明崩溃论”:任何文明既然发展到今天,一定有它的合理性。如果因为某种文明发生了危机,而断定另一种文明的“崛起”,可以拯救世界,那就更陷入了迷误。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面危机,任何制度、模式和文明都不例外。我们的任务是,真正深入到现有的所有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文明形态的内部结构里去,研究它的合理性在哪里,它的危机在哪里。在此基础与前提下,再考虑有没有可能提出一种综合性、超越性的理想,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创造新的“乌托邦”,实现世界文明发展的转机。

只有在这样的世界文明大检讨、大反省、大转机的视野下,才能真正发现和认识鲁迅对中国文明、西方文明的批判性思考的意义。我赞成刘春勇的观点,就是要打破“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样一种线性的西方理论的模式,它有它的合理性,但已经解释不了现实,也解释不了鲁迅。我们这几代最大的毛病就在于,先是把鲁迅思想与文学强拉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框架里,以后不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看鲁迅,就是站在左派立场看鲁迅,看起来讲得头头是道,其实是似是而非。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超越或左或右的既定立场和理论观念模式,在世界文明大检讨的大视野下,重新发现鲁迅的意义。这也关系到我们自身对知识分子职责的认识。既关注现实,从现实出发,又和现实拉开距离,思考人性、人类精神的根本问题,人类文明发展的根本问题,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新的理想,这才是知识分子的本职。我曾经说过,我的学术研究的最高追求,是“创造一个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和现实有批判力和解释力的理论”,我研究鲁迅,其实就是要从他那里寻求这样的理论新创造的思想与理论资源。现在看来,我恐怕已经无力实现这样的“梦想”了,这是我对自己的研究始终不满意的重要方面。我自己做不到,却在这里大谈特谈,就是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与思考。能不能做到,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但至少要关注,要思考。

(本文根据钱理群先生讲话录音整理,经钱先生修改。录音整理:孙雅静 顾静燕)

[责任编辑:周南 jidazhouan@163.com]